

教养有道勃然兴

——论郑观应与“开民智”

齐国华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提倡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由于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推进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综观他们的济世匡时之志、立言遵行之道,无不与提倡“开民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成因的。郑观应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有关他改革经济、政治等主张的论著较多,而对于他提倡“开民智”的问题却谈及很少,本文便想探讨这个问题。

一、以“教化”纠陋习

“开民智”,是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把关键钥匙,凡是有志于改革中国近代社会的先驱们,在提出他们的经国大计时,无一例外地都要涉及到这一话题。“开民智”作为一个有特定涵义的专门名词,在鸦片战争时期还未有人提及,即使像林则徐这样的先进人物,尽管在他施政的实际行动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但毕竟只是做些奠基工作罢了,而主观上还没有形成“开民智”的完整概念。到了光绪年间,郑观应就不同了,在他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蓝图中,“教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教化”,指的就是“开民智”,从办学校到讲“训俗”,他都有一套完整的设想。

针对当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郑观应作了鞭辟入里的观察与分析,他说:“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非生而恶也,生长乡闾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俯仰无资,饥寒所驱,铤而走

险矣。承平之日,上下断然日惧以桁杨刀锯,而陷于死亡者累累然相续也。其或上失其道,则揭竿斩木,弄兵潢池之中。幸而将帅得人,士卒选练,萃群策群力,不分首从,草薶而禽猕之。而此伏尸流血绝胫陷脰者,皆国家不教之愚民也,反之仁爱之天心,忍乎不忍?”^①这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结了大量的具体实例所得出的结论,指出社会动荡不安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众多百姓失去了受教育机会的缘故。他又把这些现象从国民性上作深层次的剖析,得到的回答是:“慨慨垂绝之暮气弥漫于政治社会,国家生机行且息灭,尚望其能富强耶?是故偷、惰二字,实我国人之死症也。”^②既然“偷、惰”是阻碍中国振兴的“死症”,那末怎样来消除这个“死症”呢?经过苦心孤诣的探究,他得出了结论:“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

① 郑观应:《训俗》,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488页。以下简称《郑集》。

② 《答杨君弼伯、梁君敬若、何君闾樵书》,见《郑集》下册,第252-253页。

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此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①这是进行了古今纵向比较，从历史的对比中找出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证明“蔑伦悖理之事层出不穷”的病根是在于“学校不讲”的缘故，或是说，是由于当权者对广大人民进行教育不力所造成的后果。他又进行横向比较，用世界各国的兴盛衰败和普及教育的密切关系加以说明，专门写了《教养》这篇文章，意味深长地说：“横览环球各邦……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者弱。德国之民读书者百之九十五，美国之民无不读书，宜其富强如是之速。阿洲之民未闻读书，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教养有道，而英、德、法、美诸邦勃然隆盛也。……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②居于这样的考虑，理所当然地会联系到中国封建传统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腐落后观念必须给予批判：“暴秦崛起，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韬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固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代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③这些话看似平常，但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表明它是对传统旧观念的批判与背叛，新的社会教育观念的诞生和确立。它的历史意义决不是单纯的局限于教育观念的更新，还在于时代观念的变迁，也即是对封建思想的否定。

为了取得“开民智”的预期效果，郑观应认为对普通百姓的教育应当从孩提时代抓起，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重视母教，因为母

亲总是孩子的第一个师长。为此他便极力提倡“女教”，从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着眼，指出妇女教育决不可轻视：“俗云：教子婴孩，家庭教育最关紧要。妇人失教不知书理，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富家子多是纨绔，贫家子鲜知礼貌，非失于宽，即失于严。”^④因此也可以说他把妇女教育看成为整个社会教育的基础，故而是最迫切需要创办的紧急事业了，所以在回复友人的信中，既热情又具体地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承示拟设女学校，广求中外章程妥定事。然女学校乃当今急务教本之始基。……男女平权之说，大倡于美，而渐行日本。……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今之美国庶乎近之。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是故中国而不欲富强则已，如欲富强，必须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⑤他清醒地认识到女学与男女平等、女学与培养国家有用人才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联系到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封建观念，他又提出了观点鲜明的批判：“乃中国之妇以无才是德，知刺绣、女红便夸为能事。是以为人母者文字不识，大义不谙，……教子无术，训女无方。吁！可叹矣。”最后，归根结蒂是“中国积弱之本，由于妇人无教育始。”^⑥这是深中肯綮的有识之见。

尤为重要的是，郑观应不只是在舆论上呼吁提倡“开民智”，并且还身体力行，拟定了如何“开民智”的具体方案，认为首先应该创办报馆，因为报纸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教

① 《学校上》，见《郑集》上册，第245页。

② 《教养》，见《郑集》上册，第480-481页。

③ 《教养》，见《郑集》上册，第480页。

④ 《复蔡毅若观察书》，见《郑集》下册，第202页。

⑤ 《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见《郑集》下册，第263-264页。

⑥ 《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见《郑集》下册，第264-265页。

育手段,也是传播知识的良好工具,他说:“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交也,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蔽欺饰之习一洗而空。”^① 还语重心长而又信心百倍地预言:“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② 应该说,这确是在闭塞的中国实施“开民智”的积极措施。与此同时,他也倡议广建藏书之楼,即是普及图书馆,恳切地指出:“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惟是穷乡僻邑闻见无多,疆吏亦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则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后知藏书之为益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读者之为功大也。”^③ 说明白点,即是广建图书馆以后,便能够为穷乡僻壤的贫寒书生提供较多的读书机会,使他们可以开拓求知领域,增长见识,这对改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郑观应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召,赴广西代理左江道篆,期间,他在南宁创设了“蒙养学堂”,并发布《告示》说:“尝考泰西富强之国,皆学堂林立,无论贫富,童年六、七岁例入义学读书,如违则罚其父兄。盖学堂所以开民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致富强者也。”^④ 为了使教育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他还积极推行简易教育法:“尝考泰西人材之众,实由字学浅而易明。我国文字繁重艰深,学习綦难,民智无从启发。如蒙当道奏请朝廷,择其切音易、笔画简者,通飭各省、州、县官绅设立学堂,凡年六岁者,无论贫富子女皆须入学……更设新字日报小张,卖价极廉,俾少流传。不需数年,国内无人不识字,而民智大开,风俗日美,毋以小术轻视也。”^⑤ 不难看出,郑观应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已经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社会在“开民智”问题上的近代化意识,从而使中国在近代意义上的“开民智”运动跨出了实质性的一

步。

二、用西学“开民智”

郑观应殚精竭虑地提倡“开民智”,那末究竟该用什么思想内容去“开民智”呢?回答很明确,首先他呼吁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受传统教育的致命弱点:“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举凡人情、风俗及兵、钱、谷等事,皆非素习,一旦临民,安能称职?”^⑥ 换句话说,便是原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学的制艺之学,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因此让他们来管理国家的各类事务,也是很难称职的。他甚至对当时派幼童出洋留学的举措也不完全满意,指出:“曩者派令幼童出洋,万里从学,法良意美,亘古所稀。然髫年稚齿,知识未开,血气未定,一染外洋习气,则性情心术转或支离。不如就岁科两试,所录文武俊秀,择其有志西学、年二十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为之。”^⑦ 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明他的提倡“开民智”是注意实效的,所谓“实效”的程序便是: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报效国家。然而,当时的现状与他的设想显然是有悖的,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欲作人才,先覩教养。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而外邦之风俗政事一概不知,且深以西学为可鄙。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⑧ 既是如此,如何来改变这个现状呢?于是他胸有成竹地提议说:“鄙见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科,颁行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

① 《日报上》,见《郑集》上册,第346页。

② 《日报下》,见《郑集》上册,第350页。

③ 《藏书》,见《郑集》上册,第304页。

④ 《创设南宁蒙养学堂告示》,见《郑集》下册,第195页。

⑤ 《复蔡毅若观察书》,见《郑集》下册,第201页。

⑥ 《考试》,见《郑集》上册,第203页。

⑦ 《考试》,见《郑集》上册,第208页。

⑧ 《论考试》,见《郑集》上册,第105页。

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肄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以冀渐开风气,实力研求。倘有别出新裁造成一器,于国计民生有益者,视其利之轻重,准其独造数年,并给顶戴,以资鼓励。”^① 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改革计划,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到语言文字、政治法律等的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彻底的更新,这与中国传统的“显学”当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显学”注重的是经义疏证、诗赋词章,它们主要是为士子举业而设的,但郑观应所效法的“西学”,都是注重声光化电、科学技艺,它们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可见同样是教育,但目的和手段完全不同,郑观应是经过仔细研究、精心对比后才作出判断的。

借鉴“西学”是郑观应所提倡的“开民智”实质内涵,当时的世界上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发达,他们之所以发达,是政体、科技、教育等等相互补充、互为表里的结果。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异,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痲痺残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此教养有道,而英、德、法、美诸邦勃然隆盛也。”^② 这是一个言简意赅的科学论断,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英、德、法、美各国的兴隆强盛,都是由于“开民智”而来的。因此他把中国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希望也寄托在这个模式上,言之凿凿地指出:“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交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③

这里,尽管也在宣扬“中学其本,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在当时“中学”一统天下的形势下,他公然要使“西学”也入学府的“大雅之堂”,无疑是在封建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西学”争得了一席“合法”之地,这无论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还是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同样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郑观应提倡“开民智”的观念,又是在总结洋务运动期间办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全面吸取了“西学”中对中国切实有用的各种知识,使它们能够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故而是有其创新意义的,他说:“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且彼萃数国之人材,穷百年之智力,掷亿万之资财,而后得之,勒为成之,公诸人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今中国所设之同文馆、广方言馆,历有年矣,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者。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设书院,人人皆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④ 这些话所涉及到的,除了吸取同文馆、广方言馆的经验教训外,重点突出了应使西学“人人得而学之”,这便是清楚地表明,他提倡“开民智”是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既要使“西国有用之书”译成中文,又要使这些有用的西书使“人人得而学之”,那意思当然是使能够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西学”,普及到一般的莘莘学子中间去,这不是名副其实地在“开启民智”吗?

然而,开启民智又是两个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是当权者必须全心全意地给予提倡和实力支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也必须自觉自

① 《论考试》,见《郑集》上册,第106页。

② 《教养》,见《郑集》上册,第480页。

③ 《西学》,见《郑集》上册,第276页。

④ 《西学》,见《郑集》上册,第202页。

愿地主动学习,只有这样,“开民智”才能取得实际成效。这一点,郑观应也是深深地考虑到的,他从世界大趋势和时代的需要出发,来呼吁人们积极学习“西学”。“噫!今世学者用力于科举之学,而无暇及于洋文,或视洋文为异端而不屑考求。殊不知当今之世,无论西学之不能不讲,即一切华洋交涉之事亦日繁一日,苟其不明洋文,安能周旋于其间哉?余是以知洋文必将盛行于中国,此时会之使然,吾辈因时而合其宜可也。”^①应该说,这是颇合时代潮流的忠告,从世界大势来观察,中国如果要得到生存和发展,如果不掌握西方的先进知识,那是不可想像的。不仅如此,郑观应还联系到中国教育也是重男轻女的现状,对照西方男女教育并重的实例,极力说明中国也应男女一视同仁:“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学仕学者,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②虽然,还不能说这即是“妇女解放”的同义语,但是,“女学与男丁并重”,毕竟给“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落后观念打开了一个缺口。所以说,郑观应的倡导“开民智”已具备了科学的、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意识,这并不为过。

为了证明他提倡的“开民智”确是“民富国强”的必由之路,郑观应又对人们进行历史回顾,他告诫说:“中外通商已数千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③他又用当时世界上国势积弱诸邦由于不重视教养而造成恶果的事实来提醒国人:“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

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荒,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④他举这些实例,无非为了唤起中国人民的警觉,提醒大家应该高度重视“教化”的社会作用,说明“教化”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维系着国家兴亡、民族生存的大事。这又可证明,在郑观应改革社会的思想体系中,“开民智”是占有重要一頁的。

三、育人才以“救时”

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的人才观,培养人才决不能离开时代的需要。郑观应的“开民智”、育人才当然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众所周知,他的代表作是《盛世危言》,尽管这部书的版本很多,但如若详细揣摩其内容的编排,却都是第一篇为《道器》,接着便是《学校上》、《学校下》、《西学》,然后再是其他各篇。即使是晚年编著的《盛世危言后编》,也仍然是《道术》为第一卷,第二卷便是《学务》,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编排,而是有意识地反映其轻重缓急次序的;它说明了在郑观应的心目中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是变革社会首当其冲的要务。

当时的世界形势,正是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处心积虑向外拓展殖民地的时代,而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国家则是横遭血与火的洗劫。一面是横行霸道、恣意夺掠;一面是备受欺凌、惨遭肆虐,对比是明显的,感受是痛切的,所以迫切需要改变中国倍受欺凌的现状,而要改变这个观状,又应该首先发展教育,培养为国家富强的人才。郑观应在给其胞弟的信中,详尽而直率地讲到了这一点:

① 《华人宜通西文说》,见《郑集》上册,第285页。

② 《处教》,见《郑集》上册,第287页。

③ 《西学》,《郑集》上同,第273页。

④ 《教养》,见《郑集》上册,第480—481页。

“国家之盛衰，在于人材；人材之盛衰，在乎学校。我国而欲与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舞台，而不亟思讲求教育，不可也。”^① 然而，人材是根据自己国家的迫切需要而培养的，于是，郑观应从当时中国的现状考虑，提出：“夫设科选士，本有定程。而济世求才，难拘成例。是必推广中西文学，宏开登进之途，使世人知所指归，期于实用。而后习文者不专求诸诗赋文字，习武者不徒事于弓马刀石也。”^② 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却勾画出了一个全新的人材标准。这个新的人材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人材标准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传统的人材标准完全是为巩固旧的封建制度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它要人们精通的是“诗赋文字”，以便“设科选士”。而郑观应提出的新的人材标准，却是“推广中西文学”，以便“期以实用”，不管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而客观上这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服务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是显而易见了。

众所周知，“商战”是郑观应提出“民富国强”方案的核心，但在论述如何进行“商战”时，他也是把教育列为其中关键所在的，他说：“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其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西人意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③ 这段话颇为集中地反映了郑观应的国家富强策，他把商战作为民富国强的主要手段，又把发展工商业的各类学校作为进行商战的基石，在《商务五》这篇文章中的第一

句话便是：“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④ 看来，对待这件事他是非常认真的，在他所拟的《时事急务管见二十五条》中，就有十条涉及到创办各类学校的问题，详细而具体地提出了实施办法，明确地论述了“乡、会试宜一律停止”、“设立大、中、小学堂”、“各省宜急设师范学堂、专门学堂，广育师资以备充各学堂教育”、“商轮驾驶学堂宜急开办”、“各省宜研究实业、奖励工商”^⑤等等很有建设性的倡议。这些建议又都是针对性很强的：“我国学校尚无专门，凡创设制造局、电报局、轮船局、开矿、冶铁、炼钢等事，无不借材异地，所用材料皆购自外洋，财源外溢，漏卮日多。计与东、西洋各国通商数十年，迭受外侮，尚不及日本发愤为雄。有心世道者莫不深长太息。”^⑥ 说明他提倡创办专门学校的着眼点，是在于为中国自己培养各类专门建设人材。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早就潜心于解决“财源外溢、漏卮日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大局，然而都始终没有解决。郑观应看到了中国虽然自己也在筹办“船坚炮利”，可是问题依旧存在不少，究其原因，便是“无不借材异地，所用材料皆购自外洋”，因此尽管“与东西洋各国通商数十年”，但还是“迭受外侮”，故而他要痛下决心，从根本做起，大力培养中国自己的各类专门人材，彻底改变这个现状。不能不说，这是颇具战略眼光的。为了办好这件事，他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支持办好各类专门学堂，在广西左江道

(下转第 107 页)

① 《与月岩四弟书》，见《郑集》下册，第 242 页。

② 《论洋学》，见《郑集》上册，第 106 页。

③ 《商战下》，见《郑集》上册，第 595—596 页。

④ 《商务五》，见《郑集》上册，第 626 页。

⑤ 见《郑集》下册，第 182—186 页

⑥ 《上督办京师大学堂孙相国书》，见《郑集》下册，第 177 页。

分为二。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选择配偶的条件不再是同族男女,而以“门当户对”为准则。犹太人“族内通婚”的戒规被冲破了。开封犹太人完成了汉化。

上海犹太人的幸存除了犹太人自身的努力,还有外界的帮助和特定的历史背景。1. 犹太人顽强的生存能力。犹太难民中有各行各业的人才,在困境中可以互帮互助。他们对成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教育,帮助他们自立。2. 外界力量的资助。除了上海犹太社团集资收容难民,还有许多当地的慈善团体也伸出了救援之手,加上海外团体的救助,上海犹太难民得以幸存。例如,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犹太难民居住点,造成280多人伤亡。周围的上海居民也有伤亡,但他们不顾一切抢救出不少犹太难民。3. 日本人一度推行“扶犹亲犹”政策。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人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一起成立远东犹太人大会;讨好上海、天津等地犹太财团;对欧洲犹太难民进

入上海持默许态度。目的是想利用犹太人力量的缓和与美关系。4. 上海人特有的开放心态。上海开埠时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对外来事物较易吸收。它浅小的地缘文化易于与外来文化交汇。因此,20世纪30年代,上海发展成一座国际大都市,上海人对西方文明很青睐。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增加了上海人与西方社会的交流,乐此不疲。

上海犹太人在1945年9月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离开上海。1946~1947年,大部分犹太人移民美国、澳洲和加拿大,还有南美和南非,少数去了欧洲。1948~1949年5月,一部分去了苏联;另有4000~5000人去了以色列。1949年5月~1953年,剩下的犹太人主要前去了苏联、东欧和以色列。

开封犹太人和上海犹太人的不同经历都堪称“奇迹”,谱写了中犹两个民族的友谊史。

(责任编辑:张和声)

(上接第43页) 任内,将自己的部分藏书捐献给了学堂,在《咨文》中他说:“惟事出创始,经费未裕。所有学堂应用大板书籍,近日价昂,恐一时未能筹款购办。兹敝道特将家藏之大板时务书拣选一百二十种,计共六百四十道卷,清列书目,装成一箱运上南宁,以备各学堂之用。”^① 这都说明郑观应的提倡“开民智”、育人材是躬亲其事的。

综观郑观应的“开民智”思想,其时代特征是很突出的,他已经把“开民智”的内涵渗透到“中学”与“西学”的核心中去,已经伸延到古今中外的实用知识领域里去。所以说郑观应的“开民智”意识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外沟通后的时代产物。当然,郑观应的“开民智”思想虽然是先进的,但在那个时代,具有像他这样先进思想的人毕竟只是少数,这种

完全意义上的“开民智”意识还未形成“群体观念”,它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因此也只能起到开辟草莱、启蒙初创的作用。

(责任编辑:周 式)

^① 《咨广西左江道余观察捐送南宁中学堂书籍》,见《郑集》下册,第197页。